

抗战时期的移民潮对西北社会的影响

李建国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抗日战争时期, 大量的沦陷区人员西迁, 形成了巨大的移民潮。当时大后方之一的西北地区, 移民数量也很庞大。总体来看, 这些移民的素质和层次相对较高, 知识阶层和各类技术人员众多, 工商人士聚集, 为抗战大后方建设提供了人才保障, 对当时西北社会影响巨大, 在教育、科技、工农业生产和商贸等方面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极大地促进了西北社会的进步。

[关键词] 抗日战争时期; 移民; 西北社会

[中图分类号] K 265 (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162(2008)01-0106-05

移民实边在西北历史上是很常见的事, 但抗日战争时期西北的移民潮, 则是在一种不同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因而与历史上的移民有很大的差别, 其对西北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也较大。

一

抗战时期向西部移民, 最早可追溯到 1935 年。九·一八事变后, 撤退关内的东北军被蒋介石调到陕、甘剿共, 大量的东北军家属、青年学生和部分难民随东北军进入陕、甘。七·七芦沟桥事变后,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旨在灭亡中国的全面侵华战争, 国民政府为保存抗战力量, 建设抗战大后方, 依据蒋介石“以川黔陕为中心, 甘滇为后方”的对日整体战略部署,^① 国民政府机关、部分高校、军工和重点民用企业开始有组织地西撤, 大量的私营工商企业、难民也自动西撤, 这种大规模撤退持续到 1940 年前后。在此以后, 仍有难民不断流入, 还有许多有志青年从敌战区投奔抗日后方。四川当时被放在了优先考虑的位置, 重庆成了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 又有长江航运的便利条件, 国民政府机关、企业西迁到西南的最多, 东、中部私营工商业者和难民沿江而上者也不少。仅在国民政府工矿调整委员会组织协迁有案可查的 426 家民营企业中, 迁往四川的就高达 230 家, 而迁到西北的主要在陕西, 只有 42 家。^② 因而抗战时西北的移民规模是低于西南的。即使如此, 抗战时西北移民在西北近代

历史上仍有着极重要的影响。

首先, 抗战时向西北移民涉及的范围、规模都较大。清末民初因征战、屯田、商贸等原因也有一些移民活动, 如左宗棠平定西北, 大量湖南人落户新疆, 因“赶大营”随湘军入疆的平津商人, 一度也遍布天山南北主要城市, 但其范围和影响都无法和抗战时相比。抗战时期, 陕、甘两省已基本为国民党控制, 同时, 陕、甘也是国民政府原规划的后方重点建设地区, 因而到西北的移民多在此落脚。但移民活动也涉及到宁、青、新各省。虽宁、青、新的地方军阀对外来势力持排斥态度, 但在当时抗战的大政治环境下, 也被迫一定程度地开放了。如当时“青海是抗日战争大后方, 内地来青海的人逐渐增多, 势难再保持封闭状态”。^③ 而新疆的盛世才对内地人戒心很重, 不过盛世才比杨增新还是开明了许多。特别是盛世才得到苏联帮助不小, 为对苏做友好姿态, 曾邀请了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去新疆。此外, 抗战时新疆已成为重要的国际通道, 人员、物资往来频繁, 与内地联系也是越来越密切。

抗战时期, 国民政府的一批政府机关和代办机构在西北落脚, 还有政府组织内迁、自迁和新建的许多企业, 因而移民数量很庞大。据甘肃省民政厅对全省人口统计, 1937 年为 6156192 人, 1945 年为 6564165 人(环县、合水二县该年人口未统计在内), 而抗战期间“本省出征之壮丁数约近百万”。

[收稿日期] 2007-01-07

[作者简介] 李建国(1959—), 男, 安徽涡阳人, 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 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显然，甘肃人口的增长与移民有很大关系（1945年甘肃仅寄居、暂住人口有380232人）。^④据当时在西北农专工作的朱允明先生推算，抗战时甘肃流入人口数量约在百万。特别是各交通沿线的城市，如西兰公路的平凉，甘川线的天水，甘新线的武威、张掖、酒泉等地，流入人口数量最多。陕西是西北通往中原的门户，移民数量也很庞大。如西安、咸阳、宝鸡等地仅由湖北、河南、山东、山西各省整体迁来的企业就有几十家，形成了抗战时大后方的一个重要工业基地，国民政府还在陕西设立了移民垦区。此外，还有不少平、津等地的高校、科研单位亦在陕落脚。宁夏的银川、青海的西宁、新疆的迪化（乌鲁木齐）等城市，分散流入的移民也不少。大量移民不断流入西北的城镇，这也是抗战时的一种特殊现象。

其次，抗战时向西北移民的层次也较高，尤其是知识阶层在移民中占据极重要地位，这是前所未有的。就整个抗战时期的移民情况而言，可分为三个层次：农业人口、知识阶层、工商业人士及市民。农业移民多为因自然灾害、战乱等原因无家可归的难民。国民政府为了利用难民发展生产，在政策和资金上都采取了优惠政策，在西部设立了10多个垦区，主要集中在陕西关中边沿地区和陕北，著名的有黄龙、岍山等垦区，1943年还设立西安移民招集处。此外，新疆在1942年也接收了国民政府送去的河南等地难民11366人，安置在北疆一带。^⑤宁夏、甘肃、青海的农业移民大多是零散移居，数量不大。据黄立人研究，到1942年底，西北新垦荒地约165万亩，安置农业移民68000余人。总体而言，农业移民在抗战时期的移民中不占重要地位，其影响也不及后两个阶层的大。

抗战期间，据当时的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先生统计：“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高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九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五以上西迁；低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三以上西迁”。^⑥当时国民政府为保存科技力量，培养抗战建国人才，成建制地迁向西北的高校有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还有早先随东北军迁到西安的东北大学工学院、抗战后撤向汉中的私立焦作工学院。此外，还有北平研究院等一些科研机构。因不愿做亡国奴到西北的青年学生数量更庞大，特别是西安成为流亡学生的聚集地。因西安及周边地区无法容纳，国民政府不得不考虑在别处安插。1938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派查良钊赴西安收容流亡教师

和学生，登记来自山西、河北、山东等沦陷区的教师学生2000余人，迁往天水，组成了国立甘肃临时中学（后改为甘肃五中）、甘肃中小学教师服务团。临时中学设有高中、初中、师范、职业四部。^⑦1938年5月，徐州会战后，中原一带的大量青年学生西撤，国民政府教育部命许逢熙等在华阴、渭南、西安收容了1000余人，在甘肃清水设立陇豫中学（后改为甘肃十中），后学生陆续增加到2000余人（90%为河南学生）。^⑧当时分散到西北的爱国知识分子也为数众多，遍及西北各省，有的是受命于政府、有的是被邀请、有的是自行到西北。著名的有农业专家张心一，石油专家孙健初，教育家杜重远、李蒸，艺术家常书鸿、王洛宾，著名学者沈雁冰、黎锦熙、顾颉刚、张舜徽等。

工商界人士、市民在移民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们有一部分是政府组织西迁，随企业到达西北的，而更多的是因沿海地区沦陷自行迁到西北来的，在西安、兰州这样的省会城市都有大量内迁的工商业机构。如政府协助迁陕的工厂有：来自武汉的申新四厂、富新第五面粉厂、震寰纱厂、许昌的和合面粉厂、济南的成通铁厂、山西绛县的秦昌火柴厂、郑州的光华机器厂等近40家企业。形成了以西安、咸阳、宝鸡为中心的关中工业基地。而兰州仅食品业就有上海的天生园、中国酱园、大升酱园、上海酱园、万康酱园、津邦的鲜味斋、稻香村等几十家迁来，或设立代办机构。沿西兰、甘新、甘川等交通线上的中等城市也有不少内迁工商企业。内地市民流落到西北也较多，造成西北一些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如兰州市1945年夏的人口，“较之战前几增四倍以上，其它如天水、平凉、酒泉等较大城市亦日有增加”。^⑨迁到西北的这些市民阶层，大多有一技之长，或有一定资本。因而他们在当时西北的社会经济活动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一

抗战时期的西北移民活动，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大量流入的各类科技人员和工商界人士，为西北地区的科技文化事业、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对西北地区社会的进步起了巨大促进作用。

西北地区文化教育事业长期落后，清王朝覆亡后，长期陷入军阀混战，科技文化事业发展更为艰难。甘肃省1915年—1919年财政支出中，教育费年均171568元。新疆的杨增新推行惠民政策，

1918年在当时北京政府强令下虽成立了省教育厅,全省名义上有各类学校140余所,教师200余人,但平均每校只有20多名学生,教师不到1.5人,大部徒有虚名,全年全省教育经费约10万元。^①抗战前西北高等教育仅限于西北大学、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甘肃学院、新疆学院几所学校。宁、青教育状况更为落后。抗战爆发后,因高校和科技人员内迁,西北的科教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先后改组、新建的高校有: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陕西省立医学专科学校、陕西政治学院、西北音乐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兰州分院、西北农业专科学校、西北兽医学院。原有的西北大学、甘肃学院、新疆学院也得到了扩充。在杜重远任新疆学院院长后,决心在新疆干一番事业,聘请了沈雁冰、张仲实、涂治、史枚、沈志远、高滔、鲁少飞等一批学者,并为该校购置了一批图书资料,大大提高了该校的办学水平。

由于各类人才的西迁,加之高等教育的带动,初、中等教育也发展较快。甘肃省1939年到1945年各类中等学校由34所增加到105所,小学1946年为7553所。^②教学质量也有了较大提高,武威的青云中学,“凡外地聘请的教师,都是全国各大学本科毕业生,教学质量高”,“思想比较开明自由,学术气氛浓厚”,“自然也提高了学生的质量”。^③地处僻壤的岷县中学,也因抗战时“人才内流,集中了一批业务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④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派员在青海设立的湟川中学,“管理比较完善”,无论设备还是师资都很强,“历年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成绩斐然,有口皆碑”。^⑤职业教育更是成效显著。到1946年仅甘肃职业技术学校累计毕业生达2651人,相当于抗战前近30年毕业生总数的4倍。^⑥举步艰难的民族教育在抗战时有了明显进步。在甘肃有私立兰州西北中学、知行中学、清水新民中学、国立陇东伊斯兰师范学校等。青海、宁夏的民族教育抗战期间也有了较大发展。截止1945年,青海有回民完小85所,初小245所。宁夏筹办了贺兰中学,招收蒙回青年及抗属子弟,还先后创办云亭小学13所,兼收蒙汉子弟,1944年还专为蒙古少儿创办了国立宁夏额济纳旗小学。在民族地区,还成立了拉卜楞青年喇嘛职业学校、国立青海实用职业学校等民族职业教育机构。

抗战时西北的科技事业发展是空前的,这也与大量西迁的科技人才关系密切。西北的近代科技事

业虽是在左宗棠时代伴随着搞洋务而开始的,但长期得不到发展,到抗战前,名义上有陕西棉产改进所、甘肃农事实验场、夏河西北畜种场和甘、宁、青卫生实验处等科技机构,其实际作用有限。如1934年,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开办的夏河西北畜种场,因政局动荡、疫病流行、科技人员缺乏等原因,种畜、设备损失巨大,后该场难以维持,不得不被并入甘肃省建设厅农业改进所。抗战爆发后,沦陷区大批科技人员涌入西北,为科技事业大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加之国民政府对西北地区科技事业重视,西北科技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陕西棉产改进所被扩充为省农业改进所,下设3个农场、5个林场、1个骨粉厂,在棉区还设立了若干棉花推广所和实验所。后又在杨林建立役畜繁殖场,在武功、眉县设立了配种站,在宝鸡建立了秦川牛繁育基地,在洛川设立了种羊场。1938年甘肃成立了省农业改进所(下设3个农场、4个畜牧场)、甘肃畜牧研究所等,国民政府农林部在甘设立了西北羊毛改进所,并在海原、夏河、卓尼设立推广站,甘肃兽医研究所、西北兽医防治处也相继成立。宁夏抗战前几乎没有什么科研单位,在抗战时也设立了20余个科技推广机构,重要的有肥料研究室、农具研究室、蚕桑研究室,还有水稻良种繁殖场、小麦良种繁殖场、烟草实验场、园艺实验场、植棉示范场以及推广站等。在工矿领域也有一些科技机构设立,国民政府在陕、甘分设了工业试验所,宁夏在1942年也建立了省属工业试验所。此外一些大企业也有了自己的科技机构,如雍兴公司的机械研究室、化学研究室等。

人才流入和科教事业的进步,也为西北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在甘肃各项建设中,“高级及中级技术人员,十分之九以上都是外省来的。就是大部分技术工人,也是借重河南、山西、四川等省的人。只有普通小工是本省籍的”。^⑦原金陵大学教授张心一出任甘肃建设厅长,与中国银行合作,创办了甘肃水利林牧股份有限公司,以其为核心,在甘肃开始大力进行水利建设。首先对原有水利设施进行整修,先后投资5000余万元整修了河西11县的52条渠、58条沟坝,可灌溉面积达3138570亩。还投资兴建了大型水利工程13项(肃丰、兰丰二渠工程较大,因经费不足未能完工)、小型工程43处,新增灌溉面积26万余亩。^⑧此外,还搞了电力提灌试验、农田水利勘察等。再如宁夏灌溉农业虽有两千年历史,但长期管理比较原始,抗战时建成

了引黄灌区的水文网站，成立了黄委会宁夏工程总队，完成了灌区万分之一地图 83 份，测绘面积 6631 平方公里，为宁夏水利开发和科学管理提供了依据。^⑩许多外来农业技术人员深入各县，大力推广良种和农业技术，仅在陕、甘推广的优良小麦品种就有十几个，还有玉米、谷物、大豆等。此外还倡导利用冬夏休闲地进行农作物套种，对当时流行的麦类和杂粮黑穗病的防治，都取得了很可观的成绩。据甘肃省建设厅 1945 年《甘肃省农业概况估计》，主要农作物小麦亩产可达 1.94 石（约比三十年代增产九成），马铃薯亩产 2300 斤。^⑪罗时宁（中央大学农学院毕业）在宁夏大力推广农业生产改革，“对于农林行政及技术颇多建树”，先后受到国民政府、农林部、宁夏省政府嘉奖。^⑫

在畜牧业方面，除了在西北进行品种改良外，1941 年国民政府农林部利用西迁的人才，在兰州设立了西北兽疫防治处，内分生物药品、防治两部，1942 年又成立了甘肃兽疫防治大队，采用新方法和西北防疫处生产的牛瘟脏器疫苗及血清，对当时在甘南、陇南、临洮爆发的大规模牛瘟进行防治，防疫率达 60—70%，在甘肃畜牧业史上第一次取得这样的成绩。在陕西也成立了兽医血清厂，生产牛瘟血清、牛瘟脏器疫苗、猪结晶紫疫苗等。1941 年甘肃水利林牧公司在夏河建立了奶制品厂，最高可日处理鲜奶粉 8000 余斤，极大地带动了当地畜牧业发展。甘肃的畜牧业在抗日战争时期取得了长足进展，1944 年全省大家畜存栏 22 万头，羊 614 万只，猪 106 万头，比三十年代初，羊增加了 200 多万只，猪增加了 80 多万头，达到了旧中国时的最高峰。畜牧业发展为抗战提供了大量产品，1944 年，甘肃全省畜产品有，牦牛尾 30 万斤，马尾马鬃 1 万斤，驼毛 50 万斤，猪鬃 20 万斤，驴、骡、驼、马皮 17 万张，牛皮 20 万张，羊皮 350 万张，羊毛 6.3 万吨，肉食品 6 万吨，此外还有大量狗皮、野生动物皮、羊肠衣、鲜奶等。^⑬

在抗战时西北的交通、工商等行业的发展中，外来人才的贡献也是巨大的。1937 年秋，为转运苏联援华军用物资，抢修甘新公路时，东北大学流亡到甘的罗永忱、郑恩荣等 10 余人被聘为工程师，在确保甘新公路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1937 年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派原武汉织呢厂厂长蔡得明，率张和巢、孙铎等 20 余人帮助恢复兰州织呢局（此时改为甘肃织呢厂）生产，使其达到年产军毯 20 万条。1939 年又派留法学生陈汝昌等来接替蔡

德明。^⑭1938 年秋，著名的石油专家孙健初奉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之命负责开发玉门油田，在甘肃河西展开了会战，1939 年打出了第一口油井，到 1945 年共有油井 26 口，不仅支援了抗战，也为中国石油工业奠定了基础。1941 年创办的甘肃第一家水泥公司，“除普通工多系青海民和、乐都及甘肃永登三县人外”，总经理、工程师、技工、职员，“亦多系太原西北水泥厂的老人”。^⑮在青海西宁电厂建设中，孙运璇（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对每一项工序的安排和施工，都进行仔细、严格的检查，往往一天连续十多个小时在工地奔忙”。“为保证机电设备安全无损，孙运璇先生亲自到重庆监督运送”。为成功地创建青海的第一家电厂做出了贡献。^⑯马松年（留英学生）、陶仲侃等人为宁夏的冶铁业、制糖业做出了贡献。此外雍兴公司设在陕西的机械研究室研制的成套棉纺设备，在西北机器厂投产，促进了西北纺织业的发展。在商业方面，抗战前的西北商业大都很落后，如抗战前兰州有店铺五六百家，资本也有高达数十万的。但大都属旧式商人，经营理念落后，所得利润多用于捐官或投入土地兼并。农村集镇连固定商铺都很少，交易主要靠定期的集市。抗战后，外来工商人士不仅用其商业资本充实了西北的商业实力，同时也用自己的经营理念影响着本地的商业，许多老“字”、“号”、“房”也开始改组，经营领域扩大，专业化加强，使得西北商业出现了繁荣的景象。据 1942 年对甘肃 34 县调查，共有商店 1.3 万家，其中兰州市有 2095 家，年营业额 10 亿多元，^⑰外来商业人士对西北民间商业的带动从中可见一斑。

抗战时期的移民对西北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尤其在促进西北地区社会发展方面功不可没。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仅是建立在物质资本之上，而且还建立在劳动者素质、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开发能力之上。近代以后，因工业革命，使得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化。在许多情况下，人力资本的投资效益和收益远大于物质资本投资。一般来说经济欠发达的后发地区，相应地在人才、技术方面都处于弱势。1933 年林鹏侠到兰州考察时谈到：“此省会区域，其教育情况，尚不逮内省之县城”，且“程度均甚低”，“是以经济、人才，两俱缺乏”。^⑱而民族地区因长期受落后的生产方式制约，人才缺乏更甚。因而在西北的社会发展中，知识资源往往是最为稀缺的战略资源，没有人才的引进，单凭自身的努力，很难实现本地社会跨越式的发展。抗战时的

特殊历史条件,使得西北有了这样一次人才聚集的机遇,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西北建设的人才需要,使得西北地区经济虽在极其艰难的战时条件下,也取得了近代时期前所未有的成就。陕西1937年工厂数占全国比例仅为0.25%,1942年上升到10%左右,同期甘肃工厂数、企业资本数、工人数分别由

占全国的0.23%、0.08%、0.2%,上升到了3.69%、3.19%、3.26%^⑧,而宁夏、青海的近代工业基本是从无到有。抗战时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为抗战做出了贡献,而且也后来西北社会的进步奠定了一定基础。

[注 释]

- ① 张其昀《中国国民党史概要》第二册,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年第2版,747页。
- ② 孙果达《民族工业大迁徙》,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209、249页。
- ③ 《青海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153页。
- ④ 甘肃省档案馆《甘肃历史人口资料汇编》第二辑,下,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296、342页。
- ⑤ 陈慧生等《民国新疆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334页。
- ⑥ 《抗日战争时期重要资料统计集》,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339页。
- ⑦ 李赞亭《抗战时期的国立五中》,《甘肃文史资料选辑》23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37页。
- ⑧ 张绍源《抗战时期的国立十中》,《甘肃文史资料选辑》23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44页。
- ⑨⑩⑪ 朱允明《甘肃省乡土志稿》,《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30册411页,31册323—360页,30册482页。
- ⑫ 杨思《甘肃通志稿·财赋六》,《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28册202页。
- ⑬ 傅希若《论新疆教育》,《西北论坛》1948年1卷5期。
- ⑭⑮ 《甘肃省志·教育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6页,236页。
- ⑯ 王希轩《解放前的武威青云中学》,《甘肃文史资料选辑》23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33页。
- ⑰ 王仲言《岷县一中简史》,《甘肃文史资料选辑》23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55页。
- ⑱ 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254页。
- ⑲ 张心一《六年来甘肃生产建设1941—1946年》,《甘肃文史资料选辑》26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3页。
- ⑳ 《宁夏水利志》(送审稿),转引自魏永理《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216页。
- ㉑ 《宁夏省农政七年》,转引自陈育宁《宁夏通史·近现代卷》,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215页。
- ㉒ 《甘肃省志·畜牧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21—22页。
- ㉓ 徐慧夫《从辛亥到解放前夕的甘肃织呢工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14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7页。
- ㉔ 郭仲阳《回忆甘肃水泥公司》,《甘肃文史资料选辑》8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27页。
- ㉕ 翟松天《青海经济史·近代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127页。
- ㉖ 陈鸿胪《论甘肃的贸易》,《甘肃贸易季刊》1943年4期。
- ㉗ 林鹏侠《西北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60页。
- ㉘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三联出版社1961年版,96页。

The Immigration Influence on Northwest Societ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LI Jian-guo

(College of Litera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PRC)

[Abstrac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many people in the enemy-occupied areas immigrated to the northwest area. Generally speaking, most of them were intellectuals, technical personnel, and merchants. They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s of educ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agriculture, commerce, and trade, which enhanc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northwest society.

[Key words] a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immigrants; northwest society

(责任编辑 胡小鹏/校对 古跃)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